



主 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元代史学思想卷

周少川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元代史学思想卷

周少川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元代史学思想卷/周少川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1-07809-7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②史学
思想—中国—元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892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元代史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YUANDAI SHI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周少川

责任编辑: 郑翠云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09-7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遗产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题 记

吴怀祺

在史学思想上，元代与宋代既相通，又有自己的个性，应当单独成卷。^{〔1〕}

元代史学思想与理学关系尤为密切。宋元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理学学脉上说，赵复（江汉）完成了理学北传，他编织的道统图又开启了元代的道统。通过科举，朱学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由赵复先生而许衡（鲁斋）、刘因（静修）再至苏天爵（滋溪），朱学在元代成为学术的正宗，朱氏之书，定为国是。

从朱学的传承上说，朱学由黄榦（勉斋）下接金华四先生，即何基（北山）、王柏（鲁斋）、金履祥（仁山）、许谦（白云）；再至宋濂（潜溪），已是由元入明了。黄榦另一支为江右朱学，由饶鲁（双峰）至吴澄（草庐），是为朱学南方大宗，但吴澄的学术已经变味了，“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欧阳玄、郝经为“江汉学侣”，虞集、揭傒斯俱为草庐门人，元代理学传人基本上把一代史学家都囊括在内。因此，元代理学

〔1〕 宋明的史学思想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两宋和辽、金是一个时期，元和明前期是一个时期”（见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对史学的影响就不难理解。元人论道、论性命、论理气与论经史之用、论正统，都能看出学术上的内在联系。

但元代史学思想毕竟不是简单地承续两宋。应当看到宋元理学之间的差异，进而看到元代史学思想的变化。可以说，元代理学对宋代理学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郝经、刘因的经史关系论，不同于宋儒的理念。在论历史兴亡变化时，思想家、史学家力图突破宋代理学观念支配下的正统观。杨奂作《正统八例总序》，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呜呼，正统之说，祸天下后世甚矣。”他另立新的史例重新解释历史，认为这才是“道义之本”。元人开初编修宋、辽、金三史进行不下去，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何为正统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摆脱了旧模式的束缚，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是史学思想的一次大的更新，也是理学思想的新变动。

刘祁总结金源氏亡国的教训，说：

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1]

作为金、元之际的历史学家刘祁，他说的话当然是对新统治者的期望。“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而“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不能“尽行中国法”，则是金人亡社稷的痛苦教训。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社稷长治久安，在政策上就不应当“分别蕃汉人”、固守成法而不知变，要得士大夫之心，要“尽行中国法”。理学大家郝经曾从学于刘祁，称刘祁的著述《处言》是：“其理则诣乎极而穷乎性命”^[2]，而“国家盛衰兴亡之故”^[3]是在《归潜志》中。一代史家说“理”、论历史兴亡之“故”，显然有别于前人。我一直坚持

[1] 刘祁：《归潜志》卷十二《辩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页。

[2] 刘祁：《归潜志》卷十四《续录·浑源刘先生哀辞》，第183页。

[3] 刘祁：《归潜志·附录》，第185页。

这样的观点，即：在中国思想史上，理学对史学有影响，同样，史学思想发展对理学有重要的价值。治理学史者当于此留意。元代理学变化影响到史学思想，而史学观念更新在理学发展上又具有纠偏的意义。

元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时期，白寿彝先生把宋元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组合时期，这一时期的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则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1〕}。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华文化出现万千新气象，显示其活力。《贞观政要》，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一批史书和儒家经籍成了辽、金、元统治者安邦治国、教育皇室子孙的材料。

如果说，宋代为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奠定基础，那么，元代则是中华民族文化开始大步走向世界——不只是亚洲，乃至日后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感受到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华学术文化的影响。^{〔2〕}在全球化趋势出现的新世纪，我们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其重要意义也就十分明显。

元代史学思想的魅力是它的开阔性、包容性，但元代史学思想也有弱点，其弊也浅，用皮锡瑞论元代经学的话来说，是：“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3〕}但这并不妨碍元代史学思想具有的特殊价值。

本卷从思潮入手，展示了元代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思潮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段，显示其特有的风貌，洋洋乎，大矣哉！

〔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5 页。

〔2〕 参见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 8、9 章等，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3〕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3 页。

目 录

题 记 / 1

导 言 / 1

- 第一节 元代史学的特点 / 1
- 第二节 元代史学思想的发展 / 6
- 第三节 元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及意义 / 10

第一章 元代理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 17

- 第一节 理学北传及其与史学之关系 / 17
 - 一、赵复、许衡：理学的传播及影响 / 18
 - 二、理学和史学的关系 / 21
- 第二节 求历史治乱兴衰之理 / 23
 - 一、“物盛而衰，固其理也” / 23
 - 二、通“变”而达于“数” / 27
 - 三、王道德治的盛衰标准 / 30
- 第三节 心性之学在史学思想中的反映 / 35
 - 一、以“爱心”“公心”求“天下心” / 36
 - 二、“君心”与“民心” / 42
 - 三、从心性出发探讨史学主体的修养 / 44
- 第四节 经史关系论的新发展 / 47
 - 一、史学“折衷于六经语孟” / 47

二、“古无经史之分” / 51

三、经史并重的认识论 / 55

第二章 元代史学的民族观 / 58

第一节 故国思绪与夷夏之辨 / 59

一、胡三省及《通鉴音注》 / 61

二、元代史学的故国思绪 / 64

三、对《通鉴纲目》“夷夏之辨”思想的阐发 / 71

第二节 “用夏变夷”的历史思考 / 75

一、郝经及其夷夏变化观 / 77

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历史总结 / 80

三、“行汉法”历史经验的提倡 / 84

第三节 在正统之辨中冲决夷夏之防 / 89

一、“夷夏之辨”正统观对编修三史的影响 / 91

二、正统论中新观念的兴起 / 95

三、辽、金、宋各与正统的历史意义 / 99

第三章 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 / 105

第一节 拓疆万里和域外史著述的增多 / 106

一、大一统帝国与开放意识 / 107

二、对域外史事的记载和著述 / 113

第二节 加强中外交通的历史观念 / 119

一、考信域外史地的史学追求 / 119

二、反映中外交流的历史责任感 / 126

第四章 元代史学的经世思潮 / 131

第一节 元初对宋末空谈心性的反省 / 132

一、道学家无补于世的历史教训 / 132

二、务实用世思想的提出 / 136

第二节 考核历代典制以济世 / 142

一、马端临的思想渊源及著史宗旨 / 142

二、《文献通考》的稽古经邦思想 / 145	
三、虞集及其史学 / 151	
四、《经世大典》的经世治平意识 / 158	
第三节 文献征实与历史借鉴 / 166	
一、网罗文献、考辨史料的学风 / 167	
二、苏天爵的文献学思想 / 171	
三、元修三史的历史借鉴观 / 180	
四、欧阳玄与三史的理学倾向 / 188	
结语：元代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 / 193	
本卷主要参考书目 / 199	

导 言

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它在“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的辽阔领域内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当蒙古统治者由漠北草原向四处发展时，他们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以及东欧拜占庭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等先进文化的影响，推动了本身文明的进步。以忽必烈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顺应了历史潮流，对内行中原汉法，对外开放交流，促进了元代文化的繁荣。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的结论中，曾单列《总论元文化》一节，对元代文化的成就进行总结。他说：“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2〕}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元代文化的成就。

第一节 元代史学的特点

在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元代史学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伴

〔1〕《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随着时代发展的进程，在诸多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首先，元代史学进步表现在国史与正史编撰中多民族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元代史学肇始于蒙古时期用畏兀儿体蒙文写成的国史《脱卜赤颜》，今已散佚，但明洪武年间的汉译《元朝秘史》12卷保存了它的许多重要材料。《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流，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及其生平事迹，窝阔台统治前期的活动，反映了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生产、部落战争、社会组织的重要史料。它以描写战争为长，叙事中又配以诗歌，因而其史学和文学价值都很高，是一部不朽的蒙古史著作。《元朝秘史》已有十余种外国语言的译本，对此书的研究已发展为国际性课题，形成了独特的“秘史学”。此外，译自蒙文国史的还有《圣武亲征录》，此书译成于元世祖中统年间，篇幅较小。它记载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事迹，其内容为《元史》太祖、太宗纪所本。史家认为此书也源自《脱卜赤颜》，但书中史实与《元朝秘史》稍有差异。元代继承唐宋史官制度，设立史馆和专职的史官，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翰林国史院史官有学士、修撰、编修、检阅等职，负责各朝实录的编修工作。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著录了元朝所修实录，包括《五朝实录》（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实录》《顺宗实录》《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泰宗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宁宗实录》等13朝15帝的实录，共五百余卷。其中除顺帝朝36年无实录外，其他各朝都较完整。这些国史材料记录了元朝的重要史实，虽然今已亡佚，却为明朝编写《元史》提供了基本依据。元代除了有汉文实录外，蒙文国史也还在不断地修订和增补。《元史·虞集传》记虞集主修《经世大典》，“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可见当时翰林国史院的蒙古、色目史臣还在为《脱卜赤颜》一类的国史撰写、补充新材料。

除了国史和相关史料，元代还很重视对前代史的编修。灭金灭宋时，元朝君臣就注意到对辽、金、宋三史的撰写，搜罗了相关史料，安排了修史人才。由于三朝何为正统的争论和延搁，直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三史才正式设局开修，五年十月三史相继修成。其中《辽史》

116卷,《金史》135卷,《宋史》496卷。三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撰成,是由于在设局修书之前,各史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比如,《辽史》在金朝和元初已有5次编修的过程,积累的材料丰富而系统,因而最快完成。《金史》则有保存较好的金实录和王鹗的《金史》为蓝本,而《宋史》则以宋16朝大量的国史为基本材料,再加其他史书删削而成。三史在两年多时间内迅速成书,毕竟过于仓促,或失于阙略,或失于芜杂,难免为后世所讥,但三史的修撰又各有所长。例如,《金史》向来被认为是“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1],在三史中最为完善。《辽史》内容虽较为简略,但因记辽代史事的其他史籍甚少,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至于《宋史》,史家虽病其繁芜,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因其卷帙庞大,才能保存大量的史料,提供文献征实的多种功能。总的来说,辽、金、宋三史的编修是元代史学不断发展的一件大事,三史的完成不仅保持了历代正史编修的连续性,而且与当时的国史、实录等著述一起反映了元代史学民族内容的丰富。

其次,典志体史书编撰的繁荣是元代史学进步的表现。马端临在至元年间撰成的《文献通考》348卷,在元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典志体通史以完整的体例、详密的材料和进步的史学思想,从典制沿革的角度,全面总结了宋以前的历史。元朝历时不久,却很注意典章制度史的总结。由虞集主编的《经世大典》880卷是元代官修最大的典志体史书,《大典》以会要的形式,记载了蒙古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反映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典章制度沿革,其规模与内容之宏富,可与宋代各朝会要相比。元英宗时纂集的《元典章》分前集、新集,前集60卷,记元世祖至延祐七年(1320年)英宗初政时各项典章制度;新集不分卷,记元初迄至治二年(1322年)间典制,似为补充前集而未竟之作。前后二集分类不尽相同,内容所录为元廷所颁诏令、律令和有关事例,是法令典制文书的汇编,已与会要体史书以事类为门、叙述典制和有关史实的体例有所不同。《元典章》的会典性质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其体例为后世《明会典》和《清会典》所仿效。《元典章》虽然编次杂乱、条理不清,但它保留了大批元代法令条文的原始材料,在《经世大典》散佚的情况

[1] 永瑛:《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金史》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下，成为研究元代各种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元官修法典文书汇编还有完成于至治三年的《大元通制》，它具有民法法典的性质，分制诏、条格、断例、别类等四项，共 88 卷，全书今已不传，现存的《通制条格》22 卷为原书条格项的大部分内容。此外，又有官修的《宪台通纪》正续集、《南台备要》，以及由王士点、商企翁私修的《秘书监志》。前两者所记为御史台制度，书已失传，仅存《永乐大典》辑本；后者保存完整，全书 11 卷，对有元一代秘书监的建置迁除、典章故实、职官题名皆有详细记载。

其三，元代别史、传记、史注等历史著作得以发展。元代史家在补、注《通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胡三省所作《通鉴音注》294 卷是一部传世佳作，堪称《通鉴》功臣。胡注的工程极其艰巨，《通鉴》本身部帙浩繁，有 300 余万字，而胡注的字数则接近于正文。其所涉及的范围极广，举凡《通鉴》记述的赋税、职官、舆服、刑法、天文、历法、乐律、地理等典章制度和有关名物，都详加音训注释，并指出原文或其他注文的谬误，尤其是官制、地理两项，考证更为精密。胡三省还在注文中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和见识，对史实、史法做出评论，并借注释表露他忧国忧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对于《通鉴》的补作、续作则有元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18 卷和元末陈桱的《通鉴续编》24 卷。金氏书采《诗》《书》《礼》《春秋》及诸子旧史，详加训释，对三代史事考订颇多；叙事上起唐尧，下接《通鉴》，补写了周威烈王以前史事，故号为前编。陈桱书第一卷述盘古至高辛，意在补金书所未备；第二卷采契丹在唐、五代事迹，以记辽国之兴；其余 22 卷皆记宋、辽、金三朝历史；其书仿朱熹《通鉴纲目》之纲目体，并在三朝史事的编排上强分正朔，但有关辽、宋的史料较多，可资利用。元代还有一批研究《通鉴纲目》书法的著作，意在正“夷夏之辨”，多不关乎史实，故不为后世所重。

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是元代杰出的传记体史书，取当世文献记当代名臣名士，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对旧史改造，是史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重新组织材料、形成新著的一种重要手段。元初郝经的《续后汉书》90 卷，就是对陈寿《三国志》的改造，在王朝统绪上，升刘蜀为正统，贬曹魏在闰位；其可取之处，在因《三国志》无志书，特立疆理、职官、食货等八录为志，具有编纂学上的意义。此外，又有一批别

史杂记。如王鹗《汝南遗事》、刘敏中《平宋录》记元灭金灭宋史迹，权衡《庚申外史》记顺帝朝36年大事，刘侗《北巡私记》述元末兵败、顺帝北逃情形。元代历史笔记的内容也很丰富，其中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最为突出。全书30卷，记事585条，所记以元代典章制度、历史掌故、元末农民起义为多，对于典籍、书画、戏曲、诗文也多有考证评论。又如《山居新语》《研北杂志》《农田余话》《至正直记》等笔记，对元代社会生活、文化、朝野轶闻都有大量记载；《乐郊私语》《草木子》则对元末历史有诸多反映，可资利用。以上史著，所记多为当朝史事人物，由此也可看出元代史家对当代史撰述的旨趣。

其四，元代地志和行纪的成就大大超过前代。元代的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较大进展。官修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初修本为755卷，增修本达到1300卷，它综合了唐宋总志的体例，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类，比之前代总志，体例更为齐备，从而完成了全国性地理总志的定规，并为明清一统志承袭。《大元大一统志》已佚，现存仅有赵万里的辑本10卷。除官修的一统志，私家撰写的全国性总志还有虞应龙的《统同志》、萧颢的《九州志》、郝衡的《舆地要览》、滕宾的《万邦一览集》、朱思本的《九域志》、佚名的《元混一方輿胜览》等。^{〔1〕} 这些总志多已散佚，仅有后两者的元刻残本传世。元疆域辽阔，纂修方志的范围比前代大得多，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元修方志约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现存元修方志的全本或辑本仍有14种，从其记载内容、体例和方志理论上，都比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元代方志比宋代方志较少浮华的文人情调，而更注重纪实，保存了大批原始的风俗记录和经济档案，这对明清两代方志重掌故纪实的风尚有所影响。元代方志学对方志的性质、功用、渊源、编撰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他们在方志编撰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如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凡例九条，是现存最早的修志准则。元代的行纪著述也很丰富，《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都是世界闻名的重要行纪，对于反映中外交通历史，对于研究13、14世纪的亚

〔1〕 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